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张子敬哪里肯依？他向李毅和白子明汇报，经过研究，为了躲避七路军的收编，准备带着联队到丰县，加入徐西北的队伍。高文甫于是提前来到丰县，同徐西北

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取得联系。高文甫把单县组建抗日武装的来龙去脉一说，大家都感到十分振奋，说山东的抗日形势还真是不赖，应该尽早团结起来，一起抗日！

第十二章 砀山的孟家子弟兵

王文彬、李贞乾、郭影秋、高文甫等人在院子里坐着说话，一阵阵凉爽的风吹过，树上纷纷落下白紫相间的苦楝子花，落在他们的头上、衣服上，幽香阵阵，沁人心脾。

门外传来一阵吵嚷声，有人喊道：“你一个和尚，跑这里来干什么？快走，快走！”

又有人高声争辩：“什么和尚？我有正经事，抗日的事！”

声音由远而近，进来一个身穿灰色直裰、大头大脸、光着脑袋的青年男子，大家一愣，李贞乾站起来，笑着问道：“嗨，是尹夷僧同志！你今天怎么穿着这身打扮？”

来人用袖子抹着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这不是为了走路方便吗？”

李公俭站起来，一边和“和尚”握手，一边说：“我来介绍一下吧，尹夷僧同志原名叫尹学渊，是丰县年轻的老革命了，家在丰县革命堡垒——华山区尹小楼，1929年夏天，沛县中学师范班学生、共产党员赵淘受中共沛县党组织派遣，到丰县发展党员。建立了丰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尹小楼支部，由沛县县委直接领导，采取亲串亲、朋结朋的方式，在其周边村庄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尹学渊和赵万庆等50多人加入党组织。不仅是尹小楼村，那附近的朱新庄、康庄、王庄等几个村，党员都很多，就连很多女人、老人、孩子都很支持革命，是我们一个坚强的堡垒！”

王文彬高兴地拍手，说：“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将来可以拉到尹小楼去！”

尹夷僧说：“对，我家那个地方绝对可靠，但我今天专程来，不是介绍尹小楼，而是来汇报砀山县的情况。”

王文彬点点头，说：“快坐下，喝点水，慢慢说。”

李贞乾急切地问：“快说说，砀山的情况怎么样？”

尹夷僧先端起小桌子上的一碗水，几口喝了个底朝天，抹抹嘴巴说道：“在徐州期间，郭子化书记安排我去砀山工作，发展党组织，开展救亡运动，我在砀山发展了5个党支部，成立了中共砀山特支，在咱们徐西北萧县黄口会以后，重视做砀山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砀山县动委会，还成立了动委会直属工作团，负责动委会的具体工作。以县动委会的名义，在全县各地帮助建立区、乡动委会，并组织农、青、妇、儿等群众救亡团体。这中间，有一个孟子后裔家族最让我感动！”

尹夷僧看了一下大家，接着介绍道：“周寨镇孟楼村的孟氏家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士绅之家。这个家族里有一名青年叫孟宪琛，今年29岁，1927年考入苏州私立成烈体育专门学校。他得知家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毅然从苏州私立成烈体育专门学校退学返乡，考入砀山师专，在砀山师专加入了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孟宪琛受县委派遣回到家乡孟楼村开展工作，创办了孟楼小学。这既解决了孟楼一带孩子们的上学难题，也为办成年人的夜校开辟了场所。孟宪琛在年龄较大的学生及成人夜校学员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孟楼党支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砀北区委，孟宪琛任书记。”

(未完待续)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董玉军散文集《万物志》出版

近日，散文家董玉军的散文集《万物志》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出版策划中心编辑策划，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万物志》以“万物皆有其史”为出发点，收录了作者近年来部分发表及获奖的散文，是一部运用综合手法融合家庭史、地方史以及自然史的作品。其中，有作者对人到中年境况的书写，也有对亲情和乡情的回顾，更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沉思。作品分万物志、生活志、风物志、故城志、囊萤志等五个部分。《万物志》的文章视野开阔，内蕴深厚，字里行间往往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这些文字犹如穿过时间的隧道，去寻觅生命的本质，从哲学意义上发出诘问，读起来发人深省。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掌故知鲁

曲阜碑刻(七十二)

明成化十三年遣翰林院学士王献昭告碑

崔然喆

流传千古。面对如此丰功伟绩，王献称颂孔子的功绩“宜极褒扬”，并依据皇帝旨意指出祭孔的器物“顾冕服之章数，虽隆而祀飨之，彝物弗称爱巧，彝章参合兴谕”，认为冕服上章纹的数目虽然尊贵隆重，然而在实际祭祀时，所使用的礼器却与之不匹配，故以此为由，命相关人员参照《礼记》等相关礼学典籍，对祭孔之礼进行调整：将乐舞的规格提升为八佾舞，笾豆数量提升至十二件，用“祭天祀地之礼乐”这种最高规格的仪式来祭祀孔子，以表“尊师重道之本意”。

以往明代祭孔时的礼器、乐舞多遵循朱元璋时期的规定，即用六佾舞和十件笾豆祭祀。反观孔庙中的孔子塑像，其服饰形制却采用天子专属的“十二章”（冕冠前后有玉串，每串玉珠称“旒”）与“十二章纹”（冕服上的十二种图案，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合称“十二章纹”），与礼器、乐舞的形制不匹配。故此次宪宗皇

帝派王献昭告孔庙、昭告衍圣公孔弘泰等人，将祭孔礼仪的规格提升至与祭祀天地、皇帝之礼相同的规格，可见儒家思想在明代统治者眼中的崇高地位。至此，祭孔礼器数量已然明确，后世皆沿用此法。

此次孔庙祭孔礼仪改制，时任祭酒的周洪谟功不可没。周洪谟（公元1421年至1492年），字尧弼，叙州府长宁县人（今四川省长宁县）人，于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进士及第，殿试榜眼，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周洪谟因陈时务十二事，不久升为侍读。明宪宗继位以后，周洪谟在皇帝面前直言时务，并提出君主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皇帝为之赞赏，并采纳其建言。周洪谟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文安。他在成化十二年向皇帝建言增设孔庙的礼乐规格，虽一度遭到当时礼部尚书邹干等人的反对，但最终周洪谟还是说服了礼部官员与皇帝，使得祭孔礼仪的规格由六佾、十笾豆变为八佾、十二笾豆。石碑上的“顾冕服之章数，虽隆而祀飨之，彝物弗称爱巧，彝章参合兴谕”便源自他“今冕服既用天子之礼，佾舞则用诸侯之乐。以礼论乐，则乐不备；以乐论礼，则礼为僭”的谏言。最终，在他的劝谏下，宪宗皇帝同意增设孔庙祭孔规格，并在成化十三年派王献到曲阜昭告孔庙，此碑便由此落成。

明成化十三年遣翰林院学士王献昭告碑作为祭孔礼乐规格提升的见证，不仅承载了周洪谟等天下儒生的期盼，也蕴含着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和对教育的重视，在中国礼乐制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

明成化十三年遣翰林院学士王献昭告碑，位于孔庙“成化碑亭”，刻立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三月。碑高190厘米、宽86厘米、厚28厘米。此碑为孔子六十一代孙衍圣公孔弘泰所立，正书，共十一行，行三十二字，碑文内容简洁，记载了明代宪宗皇帝派遣翰林院学士王献前往曲阜祭告孔子、昭告祭孔礼器新规的事迹，反映出宪宗皇帝对孔子与儒学的敬重。

自驱逐蒙元、重建汉人政权后，明太祖朱元璋为重塑华夏正统、巩固统治，大力宣扬儒家文化，对孔子进行高规格祭祀，将祭孔列为明代重要祭祀之一。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等曾在国子监亲自祭祀过孔子并派高级官员代替皇帝前往曲阜孔庙祭孔，此后大多数明朝皇帝不但延续此传统，而且还愈加重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宪宗皇帝于成化十三年派翰林院学士王献作为钦差，代表皇帝祭告孔子，昭告孔庙祭孔礼器的新规格。翰林院作为明代高级文官机构，通常肩负着起草诏书、参与机要等职责，是皇帝身边重要的智囊机构，其中部分高级官员被称为翰林院学士，其成员多为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精英，是未来担任高级官僚的人选。皇帝派如此重要的官员前去祭孔，可见祭孔的规格之高、任务之重要。

根据碑文中记载的内容，宪宗皇帝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闰二月十九日派遣翰林院学士王献前去曲阜孔庙祭告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在碑文中，王献用“天纵之圣”称赞孔子是上天特别恩赐的圣人，天生具备超凡的智慧，随后又用“道德配于二仪，教法昭于万世”称赞孔子德行高尚，教育方法